

昌黎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昌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编 辑：刘玉忠 张 上 董宝瑞
孙乃斌 母幼平 郭凌芸

封面设计：申玉德

摄 影：唐宝义 刘长生等

前 言

经过政协委员、文史资料通讯员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终于问世了。

我县位于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接壤的走廊地带，北枕巍巍碣石，南濒滔滔渤海，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我国北方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的县份之一。搜集与整理我县蕴藏丰富的文史资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教学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也可以在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巩固、扩大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此书征集、整理和编辑过程中，除县委、县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给予大力协助外，王来雨、贾玉洪、申玉德、唐宝义、孙自强、王世杰、张永凌等同志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难免出现不妥之处，诚恳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政协昌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随父亲两上五峰山的一些回忆·····	李葆华 (1)
李大钊的第二故乡——昌黎五峰山·····	董宝瑞 (5)
马梦花和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马晓枫 (9)
杨扶青与新中罐头公司·····	董宝瑞 (11)
回忆先父张子纶·····	张琛光 (19)
奋起抗日 英勇捐躯·····	母幼平 (21)
——记革命烈士丁万有同志	
痛打三倭寇·····	李焕宇 (47)
日伪昌黎县知事高鲁泉之死	
·····	张 上 郭凌芸 董宝瑞 (25)
私立昌黎汇文中学(附:徐维廉生平)·····	董宝瑞 (28)
汇文农科及昌黎农场·····	贾玉洪 (41)
创办马氏学校的爱国知识分子马守山·····	高泽民 (45)
昌黎县的基督教会·····	贾玉洪 (48)
✓昌黎县立民众教育馆·····	王世杰 (52)
《燕东日报》主编安大民·····	<u>芦子阳</u> (54)
昌黎美籍华人著名画家侯北人简历·····	(57)
昌黎民歌·····	王世杰 (60)
周国宝与昌黎地秧歌·····	王来雨 (73)
著名秧歌艺人张谦·····	张长生 (78)
昌黎城关放映的第一场电影·····	张士德 (18)

唐山地区体育运动的一支尖兵——红星篮球队

.....张文卿 张耀林 (82)

✓ 广济医院.....倪志颖 任淑英 (90)

民间正骨名医董凤楼.....母幼平 (93)

赵家馆的圆笼蒸饺.....张玉香 徐 强 (96)

昌黎果园发展史话.....田旭东 (100)

昌黎蜜梨栽培史略.....高竹林 (103)

大地主李三.....肅 惠 碣 阳 (105)

源影寺塔.....王来雨 张鹏起 (107)

观海胜地——碣石山.....董宝瑞 (111)

昌黎沿海的今昔.....张永凌 (116)

随父亲两上五峰山的一些回忆

李葆华

六十多年前，我曾随父亲李大钊两次到昌黎五峰山，在韩文公祠先后住了有一个半月，当时的情景有些已经淡忘，有些记忆犹新。

一九一九年北京大学放暑假后，我们全家人从北京返回老家大黑坨，没有从昌黎下火车走旱路，而是由滦县下车后在滦河边上雇了一只小船，顺水路回的家乡（其经过父亲在《五峰游记》中记述得比较详细）。在老家住了两三天后，父亲就带我由陆路来到了昌黎的五峰山。父亲之所以带我们乘船又上山，我想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水不惧的人。

到达昌黎县城后，便住在了铁道南的大德增客栈。第二天，雇了辆骡车把我们送到了山下。去五峰山的沿途，石径崎岖，路旁松林密布，间或看到一两户幽静的庭院。记得那天，阴霾的天空正下着小雨，泉水从石上流过，潺潺作响，令人感到满山景色格外清新。

在去五峰山的途中，马家山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我随父亲曾到过马家山最上头的一户人家，院子里养了不少花。父亲好象和这家人很熟，主人给我们沏了茶水，我们一边喝水、赏花，一边同房主唠嗑。休息过后，我们便顺山间小路上了马家山后面的一道山岗。这道山岗名叫“界石岭”，是马家山与韩文公祠辖地的分界处，上面有块界石，据说是马家与韩家在多少年前打官司，由县官立下的。站在界石岭顺着和尚沟向北眺望，就看见

韩文公祠了。由界石岭走下去，跨过山涧，再顺山间小路往东坡攀登，往北走不远就到了西五峰半山腰的韩文公祠。在东、西两条路的交接处，有一石筑的小塔，据说是怕由韩文公祠下来的人回西路忘记拐弯，而设立的路标。

韩文公祠，背依险峰，下临深涧，环境既清秀，又幽静。山门前有一棵老松树，枝繁叶茂，树冠由西往东南挺，很象黄山上的迎客松。树下有一块长石板，人躺在上面，感到十分惬意。守祠的老人刘克顺与父亲是老朋友了，他见父亲带我进山避暑，十分高兴，忙与老伴把我和父亲安顿在待客室。

我记得，我和父亲住的房子是座北朝南的三间正房，屋内两明一暗。靠西为南北通炕，炕上有小炕桌。北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长约五、六尺，高一尺许，上面刻有前清一位当地的画家画的韩文公祠一带的山景，并标有山界。墙下摆有一张条案，还有几把椅子。里屋靠南窗搭有一铺炕，我和父亲就在这个炕上睡觉。由于炕身短，我们爷俩只好横着身子睡在炕上。我们住的屋子西边不远，是刘克顺老两口住的屋子。我们住下以后，他们为我们忙着做饭，用松球（当地方言称“松稗稗儿”）给我们烧茶水喝。老两口在我们住的屋子东边，开垦了一块荒地，栽烟种菜。此外，他们还看管祠堂周围的树林子。祠堂下边的山涧里，长满了树，其中有很多是山核桃树。从这里到界石岭，有一条近路，但很难走。我记得，看祠堂的刘克顺老人，个头不高，圆脸，待人很和气。他的右额上有个肉疙瘩，据他讲，是年轻时赶车拉庄稼，让滑脱的绞杠打伤后留下的。

站在韩文公祠的庙台上，可依稀看到大海，看到七里海和新开口（原来我一直误认为是滦河口），看到海上行驶的轮船。给我较深印象的，还有京山铁路和铁路上行驶的火车。从山上看，火车就象一条爬行的长龙，很有趣。

来到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避暑好地方以后，父亲带我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写作，只是在工作疲劳时，才走出屋子散步休息。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离开北京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寄到了北京。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寄走《再论问题与主义》之后，父亲便全力投身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中去了。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从城里来了两个外国人，来山里游逛。他俩进了韩文公祠见父亲的案头有不少书，就翻阅起来，发现有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便提出要借去看看，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大约过了六七天，那两个外国人又上山，把那两本书还了回来。他们两次和父亲用英语交谈了好久，看来他们对父亲带来的这两本书很感兴趣。我估计他俩是在昌黎城内基督教会工作的美国人。

在父亲忙着看书、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坐在一旁做功课，更多的时间是跑到外边去玩，挖水晶石，采野果。父亲有空闲时，也带我到山里游览。记得，我们曾去东五峰的果园，看果人给我们摘了不少水果，他姓陈。

这年夏天少雨，干旱。我们到五峰住了好些日子才下了一场暴雨。山水流下，顿时形成了瀑布。瀑布响声隆隆，很吓人，好象要把屋子和人冲走似的。这场大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二四年春天，我跟父亲再次来到五峰山，又住在了韩文公祠。这次是随父亲来避难的。当时，父亲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为了躲避缉捕，他化了装，带着我连夜乘火车来到昌黎，清早在昌黎下火车后就直接进了山。我们这一次又在山里住了一些日子。父亲不再出去游逛，我也很少出外玩耍，没事就看由北京买到的一本《镜花缘》。后来，我表哥赵希增（他曾由父亲介绍到昌黎新中罐头公司当工人，后来不干了）带着党内一位同志给父亲送来紧急通知，让父亲到苏联去开会。接到通知的第二天，父亲就下山动身回了北京，准备由北京同其他代表一起出国。临走的时候，父亲把我的那套《镜花缘》要去了，说是在路上消磨时间用。后来，他把这套《镜花缘》留给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学们。

父亲走后，我同希增回到了大黑坨，见到了已由北京回到家乡的母亲，同妹妹弟弟又聚在一起。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来过他平生最喜爱的五峰山。

〔据1985年10月13日李葆华同志重上五峰山凭吊韩文公祠遗迹时的谈话，董宝瑞记录整理；1986年3月3日经本人审阅〕

李大钊的第二故乡——昌黎五峰山

董宝瑞

李大钊同志革命的一生中，在国内国外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战斗足迹。在家乡一带，除了乐亭县大黑坨外，留下他战斗足迹最多的地方，莫过于昌黎县的五峰山。

李大钊同志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与乐亭县相邻的昌黎县城南偏西三十六公里处，从那里完全可以眺望到历史名山——碣石山（位于昌黎城北）的巍峨雄姿。曾留下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游踪的碣石山的雄伟气势，使在濒海平原长大的李大钊同志十分神往。他在青少年时就非常渴望登上碣石山尽览沧海风光。那么，碣石山有主峰仙台顶和其他许多峰峦，为何李大钊独独喜爱上了仙台顶迤东的五峰山呢？这是因为五峰山为碣石山中有名的奇景胜境之一，临海较近，景色旖旎宜人，而且半山腰还建有一座韩文公祠。韩文公祠所在地原为圆通寺庙址，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天，山石道范志完（次年升任山海督师）从昌黎城拜谒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修建的韩文公祠后到此游览，认为其地“天生文笔峰”，决定在此再建一座韩文公祠。当年施工修成正殿三间，内塑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泥像。范志完还在庙后峭壁高处令人刻下“泰山北斗”、“五峰环翠”八个字，并由县丞出面为自己修了一座“范公洞”。到清朝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当地人又在正殿东扩建三间客厅，并加修院墙、院门，及守祠人居住的两间耳房，从而使韩文公祠显得更加清秀静谧。

李大钊同志每次到五峰山均住在韩文公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到天津上学后与碣石山结“初度之缘”时（约当1908年暑假），正赶上“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不能领略“碣石观海”风光，便冒雨去五峰山韩文公祠游览，在那里遇到一件趣事。当时，由于不识途径，他和同去游山的三个同学在五峰前的一道山梁上迷了路，焦急中他们齐声高呼：“五峰，你在哪里？”没有想到，云烟缥缈中竟传来了答声：“五峰在这里——”他们寻音觅去，来到五峰半山腰的韩文公祠，却见一皓首老者（守祠人）正倚门笑迎。恍惚间，李大钊真以为入了蓬莱仙境。第一次登五峰山，就给他留下了美好、新奇的印象。几年后，他在《游碣石山杂记》中追忆说：“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

从此，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一三年秋天，他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准备去日本留学。在出国之前，他特邀一名同学到五峰与祖国山河作别。这一次，他在韩文公祠住了十来天，每天起早睡晚，留连于松风泉石之间，攀援于峰嶂崖巅之上，寻奇境幽趣，赏胜迹佳景。可是，就在这荏苒十日间，碣石山南麓的昌黎车站却发生了一件侵华日寇杀害五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李大钊闻讯赶去吊唁，义愤填膺地说：

“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誓雪国耻，有如碣石！”之后，他就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去了。

李大钊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由日本归国后就投身于唤醒民众的斗争洪流中，直到一年后才得以与五峰重逢。在到五峰旧地重游之前，他写了一篇杂谈《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载1917年7月4日《甲寅》日刊），在谈及“北京附近供旅行之名所”时，着重提到了碣石山与五峰山，文中说：“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

览无既……”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主任后，把五峰山定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接连两年到五峰山韩文公祠消夏，并进行重要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夏天，他在五峰山韩文公祠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资料，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一九一九年夏天，他从五峰山韩文公祠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著名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信末注明“寄自昌黎五峰”），撰写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九二〇年以后，他虽无暇到五峰山避暑，但曾携带夫人及子女到五峰山韩文公祠游玩了一次。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化装由北京到五峰山避难，躲避了反动军警的追捕，并由这里启程去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据考查，李大钊生前至少七次登临五峰山，在韩文公祠留居累计达七、八十天。难怪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说，五峰山几乎成了李大钊的“第二故乡”。

在数度游览碣石山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的过程中，李大钊还写了不少游记和诗歌。游记有《游碣石山杂记》、《旅行日记》、《五峰游记》等，诗歌有《山中即景》三首，（其中两首有手迹遗存）、《悲犬》、《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极富有诗情画意的书信。他在《致若愚、慕韩信》中，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到五峰山游览，云：“我所居的地方名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楼，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兄等盍来此一游？夜间八时由京登车，次晨天明即到……东行二三站，即是北戴河、山海关，大可一游。”在《从五峰致郁巖信》中，他说自己的山居生活，“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并说“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

煞也”。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在五峰山度过的美好时光由衷的喜悦。

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进行重大革命实践活动的地方。他在五峰山撰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都是在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我党诞生的历史中占据显著位置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此外，五峰山还是李大钊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源泉，在其文学创作活动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可惜，岁月流逝，如今五峰的山在，水在，韩文公祠却只剩房基了。重修五峰山韩文公祠，是生活在先烈第二故乡的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多年的强烈愿望。预计不久的将来，昌黎人民为缅怀李大钊同志的丰功伟绩，将会把韩文公祠重新修建起来，让它重新屹立在五峰山的苍松翠柏之间，迎接各地的游人。



马梦花和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马晓枫

我的堂兄马梦花（字颖芬），与周恩来同志一起于一九一三年同榜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两个人年龄相仿，入学后一见如故，很快结为密友，后来还换了“帖”，成为“金兰之好”。马梦花在县里读私塾时，以聪颖好学出名，颇为自负。自从见到周恩来同志以后，他方觉自己才疏学浅。他对勤奋好学、谈吐不凡的周恩来非常钦佩，他以周恩来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为荣。马梦花是周恩来在学校里组织各项社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周恩来演话剧，他在后台当工作人员。他协助周恩来创建敬业乐群会，办文艺刊物，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记得有一期《敬业》杂志上，前面有周恩来的文章，后面有马梦花的小说（马梦花很喜爱文学）。后来，马梦花还把周恩来同志创办敬业乐群会的作法带回了家乡，一九一六年放暑假时，在昌黎城关孔庙旁的明伦堂，办起了昌黎暑期敬业乐群会，组织在天津读书的学生和本地学生、教师聚会，开展文艺、体育等活动，把南开中学的好校风传到了昌黎县，使境内有了新文化的气息。我记得，张聿祖、宋子扬、马敬伯等好多人都参加了暑期敬业乐群会的活动，共活动了两年。

一九一七年暑假，马梦花和周恩来都从南开中学毕业了，两个人决定都去日本留学。我记得，这年夏天，周恩来在出国前去东北探亲途中，来了一趟昌黎。他刚下火车不久，我就在马梦花家见到了他。当时，我快高小毕业了，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马梦花

的要好同学周恩来（其实我早就知其大名了）。周恩来到昌黎的消息传开，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几个学友都赶去看望他，张聿祖、宋子扬、马敬伯等都去了。当天下午，他们一同去游览小东山，在小东山上观赏昌黎古城和碣石山的景色，眺望海边的金黄色沙丘。晚上，他就宿在了马梦花家，第二天上火车走了。后来，他与马梦花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曾寄回来一张合影照片，穿的是当时日本学生制服。可惜，这张照片没能保存下来。

一九一九年，我也考入了南开中学。几年后，我从天津读书回来，去马梦花家串门，想从客厅的书橱里找一本书，无意间在《随园诗话》后边翻出了周恩来同志的照片和南开中学毕业文凭。我看了一下，放在了里间的掸瓶里。当时正闹军阀，后来这照片与文凭都失落了，我只记得文凭上的号码中有一个“七”字。

（张上、董宝瑞记录整理）



杨扶青与新中罐头公司

董宝瑞

本世纪初，自上海泰丰公司开始设厂生产罐头后，这项新兴的食品工业引起了国内民族资本家的注意，沿海各地纷纷开设罐头食品厂，兴盛一时。一九二〇年，在被誉为“花果之乡”的河北省昌黎县，由留日学生杨扶青筹建，也开办了一家罐头食品厂，称“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

杨扶青，名永兴；扶青为字，原写为“辅卿”、“甫青”。他于一八九一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杨岗子村，其父杨焕亭从少年时便去东北学生意，因经商有方，后成为闻名东三省的日升货栈的总经理。杨扶青自幼读书，在乐亭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滦州师范学校，后由滦师考入天津水产专科学校，从此与水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就读期间，由于杨扶青为人正直，学业精湛，深得校长孙子文的赏识。一九一五年他由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毕业后，连同其他九位同学，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留学。在留学期间，他参加了由天津留日学生组织的“新中学会”。新中学会的信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新中华之崛起搞实业救国，一个是自身廉洁，不吸烟，不喝酒，不纳妾，不赌博等。杨扶青很赞同新中学会的信条，同会友一起住在被称为“新中寄庐”的会员宿舍，一起过集体生活。在留学的后期，他通过新中学会的会友童冠贤结识了到日本求学的周恩来，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至交。当时，周恩来经济拮据，杨扶青常慷慨解囊，给予他一些资助。一九一九年，杨扶青从日本东京毕业回

国后，不久就由家乡来到昌黎，集股筹办新中罐头公司。

杨扶青选择昌黎作为他搞实业救国的基地是很有眼光的。首先，昌黎靠山临海，城北碣石山区盛产苹果、梨、葡萄等各种水果，是历史上有名的“花果之乡”；城南靠近渤海，有大蒲河、新开口等渔港，每年有大量鱼虾上市。而这些都是生产罐头的主要原料，可就地取材，不必远走他乡。其次，昌黎县城地处京奉（北京至奉天）铁路线上，交通比较发达，而且这里位于关内外交通要道的咽喉地带，西通津、京，东达东北三省，便于打通产品的销路。再说，昌黎与乐亭是邻县，人熟地熟，有利于开展业务活动，并可以为家乡人办一件好事，为振兴地方经济作出一份贡献。

回乡开办罐头食品厂，是杨扶青的夙愿。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经过深思熟虑，与同乡学友张子纶商量好了，回国后一同到昌黎筹建新中罐头股份有限公司。“新中”之名，取于新中学学会称。对杨扶青回乡办罐头生产企业，周恩来同志很是赞成，当时杨扶青为筹备建厂事宜去天津，周恩来曾对他说：“你办吧，办成了让我弟弟去做工。”

新中罐头公司的厂址最初设在昌黎城关西门里路北一所院子里（现城关镇卫生院所在地），生产规模较小；稍有发展又搬到鼓楼西街道南的一所大院里，其西隔一户张姓人家为奎星楼胡同的北口，其南与县立高等小学堂（原碣阳书院）为邻。大院临街的北屋为罐头生产车间，靠东为一大车门；院中的东厢房为饼干生产车间。公司的办公室设在与这大院斜对的张家胡同南口内，并为贝扣生产车间。公司在开办时，共集有两千股（每股五十元银币），合计为十万元的资本（其中新中学学会也入了一部分公股）。由杨扶青任经理，并设有董事会，有董事若干人。股东限于工、农、商、学界，其董事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典